

党史资料与研究

第二辑

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办

二〇〇四年四月

党史资料与研究

第二辑

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办

二〇〇四年四月

编 者 按

原淮阴市政协主席张景良,以 80 高龄,撰写了《对淮阴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回顾与调研》。该资料约 15 万字,分八个部分,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曲折实现和作者思想认识的变化过程为两条主线,全面回顾了淮阴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历史,记述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生产力解放带来的农村社会进步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揭示了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我们就能不断取得事业进步。该资料还对如何引导家庭联产承包制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作了认真地思考,并提出了建设性的见解,现实与前瞻相结合,对我们今天开展农村工作有深刻的启示。

全文史料丰富,弥足珍贵,以感性资料为主,兼有理性分析,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寓深刻的原理于平凡的事例之中,富有教育意义和保存价值。有助于我们研究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的农村状况。

在全国上下关注“三农”问题的今天,刊出这本资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的农业、农村、农民状况与以前相比,虽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回避,因为它关乎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社会稳定及小康社会的建设。愿我们从中汲取经验、记住教训,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有关树立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精神,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善待农民,努力开创农村工作新局面!

目 录

一、包产到户主张的历史背景	2
二、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一场争论及我的反思	4
三、包产到户主张被否定的不良后果	48
四、1979年后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曲折过程及其 主要经验	50
五、我对包产到户的错误认识是怎样转变的	82
六、包干到户后的二十年农村经济持续全面发展	99
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再认识	117
八、对引导支持家庭承包经营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 调查与思考	148
后 记	223

对淮阴地区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回顾与调研

农业生产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们党和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成功的实践。我们淮阴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人主张包产到户,因“左”倾思想的影响,多数党员干部不赞成,我更持反对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批判“左”倾,端正思想路线,广大党员干部逐步解放思想,我也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改革实践。至1982年全区全部实行包产到户,1983年全部实行大包干,农业生产获得飞跃地发展,这对我更是深刻教育。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及身边保存的日记,参考有关档案资料,并访问有关部门的同志,对包产到户的历史背景、曲折过程、本人思想演变、家庭联产承包带来农业、农村、农民的巨大变化、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引导支持家庭承包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作一粗浅的回顾与思考。其主要目的在于个人进一步清除思想上存在的“左”倾的影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唯物史观,进一步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性,提高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一、包产到户主张的历史背景

在党中央于 1953 年提出的以一化三改造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淮阴地区于 1956 年春就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合作化的第一年,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三季严重减产。全年粮食总产 21 亿斤,占计划产量的 42%,灾民 339 万人,人平收入 30 元。灾荒形成后,全党全民动员,全力以赴,依靠农业合作社,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自救运动,辅之以国家救济。1956 年至 1957 年春,地、县、区干部四次查灾,每次都在万人以上,及时解决了灾民生产生活困难,通过艰苦努力,全区没有饿死一个人,没有逃荒要饭,没有荒一亩地,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1957 年冬,通过贯彻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1956 ~ 1967 年农业发展纲要》以及《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根治徐淮地区洪涝灾害、改变贫困面貌的决定》,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水利建设、绿化造林、积肥造肥运动,遗憾的是 1958 年急于求成,搞大跃进以及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在“左”的路线指导下,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瞎指挥风、特别是共产风,一平二调,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加上粮食高估产高征购,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造成丰产不丰收,增产变减产。1959 年上半年,通过两次郑州会议精神的贯彻,开始纠正“左”倾错误。但是到了下半年,风云突变,通过贯彻

庐山会议精神,纠“左”被中断,在各级干部中开展反右倾斗争,在群众中开展“左”的社会主义教育,把一些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满的怪话怨言,都当作右倾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在此基础上,1960年又搞新的大跃进,一连串的大办,出现新的虚报浮夸、共产风,继续高估产高征购,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严重困难,体力下降,相当多的人患上浮肿病,更突出的是泗洪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幸亏毛主席及时发现全国五风问题的严重性,于1960年11月中旬先后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通过这两个文件精神贯彻,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县、乡、大队彻底算账退赔,在此基础上贯彻落实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解散食堂,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部分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左”的路线未能从根本上纠正,这就妨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的调动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1961年全区粮食总产为22.84亿斤,比1957年粮食总产29.8亿斤,减产23.35%;棉花1961年皮棉19.9万担,比1957年23.3万担减产3.4万担,减产14.3%;油料1961年总产1528.3万斤,比1957年油料总产9076.6万斤,减产83%;生猪1961年5月圈存78.4万头,比1957年121.5万头减产43万头,减产34%;社员口粮1961年为224斤,比1959年减少39.1斤,比1960年减少89.1斤,较1957年减少138斤。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

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农业生产发展、集体经济巩固、社员收入增加与生活改善,是当时淮阴地区上上下下十分关心、亟待研究、探索的问题。包产到户的主张,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实,在1961年,以贯彻落实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为内容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不少人主张包产到户,淮阴县公墓公社刘老庄生产队社员倪德积极主张包产到户,大队书记赵书同也说:“要把生产搞好,光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不行,应当实行包产到户,先把土地按劳力强弱划到户,规定各户上交粮食任务,这样做才能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地区机关下放干部陆广德说:“土地不包到户,生产永远搞不好”。泗阳县农工部长严同仁讲包产到户有六大好处。可惜当时在“左”的思想指引下,这一主张没有为地、县领导采纳而予以否定。

二、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一场争论及我的反思

(一)争论的始末

1、1964年6月14日,地委书记孙振华在地委常委办公会议上,传达华东局召开的农业生产恢复与发展的座谈会精神。他说:“华东会议上,不少人认为依靠集体恢复生产有困难,特别是资金不足,如果单靠集体,势必形成农民种田,国家出钱。座谈会上,江苏小组讨论恢复生产有四条途径,一是坚持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坚持五统一、四定、三包、一奖;二是包产到户;三是分田到户,退

到土地改革以后；四是井田制，私田解决各户口粮，公田负担国家粮油棉统购任务。华东局、柯庆施主张各地就这些办法调查研究，典型试验。”孙振华还说：“华东会议期间，毛主席也在上海”，我问：“毛主席怎么说？”孙讲：“国家现在搞成这样，毛主席怎么好讲？”我听了当时心想：“党内高级干部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主张？相信毛主席不会同意后面三条主张，一定会澄清这一问题。”常委会上，大多数同志主张坚持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巩固发展集体经济。惟有孙振华主张：“困难严重地区实行自由主义，包产到户，退到土改，都可以。”他还说：“我们不向这些地方要粮，也不给这些地方钱和物，领导上可以集中力量，支援高产地区，搞好集体经济。”常委办公会议确定召开有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地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与部署华东局扩大会议精神的贯彻问题。

2、为了做好常委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地委副书记方振召开了有农工部、农林局、水利局、手工业局、地委办公室、专署办公室 20 多人参加的会议，具体讨论恢复发展生产途径。会议开始，方振同志说明议题后，要我讲，我说：“不论进与退，都应当有个适度，过去进过了头，刮共产风，不对。现在退，提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30 年不变，为什么一年不到，又要变来变去呢？”农工部长戴淑仁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究竟走什么途径？应当让群众作主，现在群众对我们有不少怨气，离心离德，如果硬是把大家捆在一起，我们更会脱离群众，那就不利于工农联盟，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更不利于备战，万一

打起仗来,谁个跟你打敌人呢?”农工部副部长王子增不同意戴的看法,并从理论上分析坚持生产队核算的必要。戴淑仁说:“这些空头大道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要个人患得患失,不敢面对现实。”水利局副局长洪德聪赞成戴淑仁的意见说:“没有机械化,就不可能搞好合作化,当前农业生产靠的耕牛、旧式农具,以手工劳动为主,最适合的生产关系是包产到户。”手工业局长张润芝也主张包产到户,并向王子增挑战说:“你带一个组去一个大队,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长期驻在那里具体指导,我去一个大队搞包产到户,既不带工作组,也不要长期驻队,只是年终分配时,去那里拿征购粮食,倒看哪个能更快地发展生产。”会议结束前,地委副书记方振提出:30%地区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30%地区扩大自留地;40%地区自由主义,群众要包产到户就搞包产到户,要单干就单干。戴赞成方的小结说:“这才是灵活的马列主义”。

这次会后,按照方振的意见,组织几个人搞恢复发展生产途径的调查。张润芝去淮阴县五里公社,洪德聪去泗阳县里仁公社,农工部副部长王桂林去涟水县成集公社,戴淑仁去自己的家乡调查。张、洪、王各搞了一个大队依靠包产到户恢复发展生产的方案。戴因看了刚发下的柯庆施在华东局扩大会上强调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讲话,就未试验包产到户,搞了一个大队把自留地扩大到占耕田面积20%的方案。

3、6月18~25日,有县委书记参加的地委常委扩大

会上,张润芝、洪德聪、王桂林具体介绍了他们搞的一个大队包产到户的方案,我与王子增对他们的方案提出了否定意见,会上多数县委书记反对包产到户,反对任意扩大自留地。涟水的孙燮华、灌南的陶硕夫主张把自留地扩大到占耕田面积的30%以上,只有宿迁县长郑尊富赞成包产到户。他在会议休息时,亦曾和张润芝提出向王子增挑战的计划,比一比是包产到户发展生产快,还是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发展生产快。当时遭到洪泽县委书记王集成的反对。王说:“你们带一工作组去洪泽挑一个大队搞包产到户,如果年终既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又安排好社员生活,我就佩服你。”孙振华发现多数县委书记反对包产到户,亦在发言中强调巩固集体经济。戴淑仁在发言中也未主张所有地方搞包产到户,而只赞成部分困难严重地区搞包产到户,并强调一般地区应当扩大小私有,不过他说:“硬是骑在马上是不行的,公有制度不能当饭吃,人都死了,还讲什么制度呢?”后来孙振华、方振要我们地委办公室起草会议小结,我与秘书倪戒非按照会上多数同志意见,在起草文稿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孙振华看后不愿讲,要方振讲,方又推给戴淑仁讲。戴一方面按照我们地委办公室起草的稿子讲,另一方面又离开稿子讲包产到户,也是有道理的。

会后,地委印发了县书会议纪要,其主要内容:一是分析形势,讲淮阴地区在经济上虽然存在许多困难,但克服困难,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存在五个方面有利条件,包

括：通过贯彻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与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目前生产形势好的队占 57.1%，生产面貌已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占 33%。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水利建设比过去有很大的改善。各级干部取得正反两方面经验，在党中央领导下，各项工作有了具体政策，有章可循。干部作风有了转变，干群关系有了改善。二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强调要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就必须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分析包产到户有七大害处。肯定扩大自留地是必要的，但不能任意无限地扩大自留地。三是对巩固发展集体经济，提出六个方面措施，包括：彻底清理公社大队平调占用生产队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物资，要退还给生产队和社员；健全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搞好集体的收益分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改善经营管理，改进评工记分，民主管理粮草钱，帮助生产队解决生产资金问题。

4、7月上旬，省委农工部长刘伯英连打数次电话要地委派人去盱眙研究包产到户问题。华东局常务书记魏文伯亲自带几个人来淮阴调查包产到户问题。地委副书记李昌文向魏文伯汇报了华东会议贯彻过程中有关发展生产途径的争论情况，并把地委关于巩固发展集体经济不赞成包产到户的报告拿给他看，同魏文伯一起来的戴星明把报告中讲的反对包产到户七个论点，逐条用铅笔划杠加批，有的批“站不住脚”，有的批“教条主义”。后魏文伯找地委农工部的戴淑仁、王桂林座谈，他们汇报了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的典型调查，魏文伯大加赞扬，说：

“从南到北都主张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经营管理方法的改进，不是方向道路问题，因为它不是集体经济性质的改变”，“包产到户可以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可以减少干部管理生产的麻烦，生产上可以实行老农当家，以避免瞎指挥。”跟魏文伯一道来的戴星明还对王桂林说：“淮阴人为什么在大跃进时期敢做积极分子，搞包产到户就不积极了呢？”魏文伯要戴淑仁、王桂林打消顾虑，大胆搞包产到户，不要怕当右派。魏文伯又去洪泽县召开社员座谈会，据洪泽县委办公室同志说：“他在座谈会上讲包产到户有七大好处。他们去洪泽的三河闸参观，遇见两个行路人，即问从哪里来？这两个人答：“从盱眙来。”魏问：“你们听未听说安徽搞包产到户？”这二人答：“从未听说”。魏问：“包产到户好不好？”一个人说“好”，另一个人说“不好”，魏称赞主张包产到户的意见，讲了包产到户七条好处。这两个人说：“上级领导说好，我们就照办”。魏文伯回淮阴路上，到武墩公社粮站躲雨，询问公社社长孙如方今年计划产量，孙如方答：“2500万斤”，魏问：“征购多少粮？”孙答：“200万斤”。魏问：“能不能完成？”孙说：“从几年情况来看，完不成，任务大了”，魏讲：“不是任务大了，而是农民的积极性未调动起来，过去你们一家一户生产不是积极性很高吗？”戴说：“过去小农经济，生产哪里能搞得好？如果说生产搞得好，怎么当时很多人没饭吃呢？”魏讲：“那是因为国民党不领导生产，现在你们把土地包到社员各户保证搞得好。”孙讲：“那不是包产到户吗？”魏讲：“在共产党领导

下,搞包产到户,不会出问题的。”

魏文伯又派两位秘书去灌云县杨集公社农旭大队调查。杨集公社是淮阴地区生产搞得好的先进单位,1961年差出粮食1900万斤。农旭大队又是杨集公社的模范大队。根据灌云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回忆,两位秘书在农旭大队第三生产队召开座谈会,他们首先查产量,发现1961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增产40%。又查询社员收入情况,发现几户富裕中农人平口粮下降100多斤。他们指出口粮下降是因为平均主义。他们又专门替两户富裕中农算账,看入社后吃了多少亏。他们又问:“怎样提高口粮水平?”两位富裕中农社员谈:“土地包给我们,当然可以提高口粮。”会上座谈结果,全队29户社员,仅有4人赞成包产到户。

后来,魏文伯又去泗阳农场调查,这个农场是粮棉双高产的先进单位。1961年亩产皮棉195.5斤,每亩上交48元。跟魏文伯同志一道来的戴星明同志说:“农场如果搞包产到户,可以搞得更好。”

魏文伯离开淮阴后,去连云港市望海楼招待所,找了徐州、淮阴两个地委负责同志和几位县委负责同志座谈,据淮阴去参加会议的李昌文讲,魏在会上着重讲包产到户的好处,灌云县委书记黄启不同意包产到户,被批“思想保守”。连云港市市委杨副书记说包产到户有十大好处,魏赞扬说,到底你年青,肯动脑筋,想出十条好处。我只想出七条好处。李昌文说魏文伯给人的印象是对包产到户热心的宣传者提倡者。现在回过头来看,魏文伯来

淮阴调查研究，旗帜鲜明提倡包产到户，思想解放，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我当时认为他右倾，违背毛主席有关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与党中央不一致。

在魏文伯的鼓励下，淮阴地委农工部戴淑仁与各县农工部通了电话，介绍省委农工部在泗阳调查情况，要各县研究：“包产到组、部分作物包产到户、所有农作物全部包产到户几种包产形式，以哪种形式为好？”并派人去泗阳的城厢公社、涟水的朱前公社、灌云的下车公社搞包产到户的试点，又亲自去淮阴县的新渡乡召开干部社员座谈会，座谈包产到户问题。

5、中央定于8月上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恢复发展生产问题、粮食问题、市场问题、支农问题。为了开好会议，中央提出几十个问题，要省委、地委讨论。遵照这一指示，地委于7月15日晚，召开了有几位书记及地委办公室、农工部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讨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下面是我当时对会议讨论情况的纪要：

孙振华：大家谈谈我们这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

张景良：我们这里应当坚持现有阵地，巩固现有阵地，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能再退，变来变去。

方振：从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所有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大多数地方生产已上了头绪，我们应当坚持生产队所有制，依靠巩固

集体经济来恢复发展生产,不能无限制地退。

孙振华:是的,我们这里应当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能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实在无法坚持的生产队,社员要求包产到户,就让他们搞包产到户。这种生产队,恐怕不会超过10%。

戴淑仁:包产到户,集体经济的性质未变。我看应当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允许有多种经营管理形式,比如:包产到组,部分作物包产到户,全部作物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就是有20%,也未为不可。

张景良:照你这样说,包产到户集体经济性质不变,我不同意。包产到户,就是单干,谈不上坚持集体经济。

戴淑仁:包产到户,集体所有制不变,还是生产队统一核算分配,仅是管理方法的改变,这些你未弄清楚。

张景良:包产到户后,个体生产与生产队统一分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据张雄飞说,听人讲,安徽搞包产到户后,社员普遍自偷自,超产变“减产”,大家都“减产”,也就谈不上什么超产奖励与减产赔偿了,形成谁种谁收,谁收谁得,这叫什么统一分配呢?

戴淑仁:我不同您抬杠子,我也未去过安徽,抬杠子也没有用。我也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

秦奇均:包产到户,恐怕实质上就是单干。

孙振华:从安徽来说,包产到户后,18亿斤征购粮食未拿上来,这是事实。

戴淑仁:我们应当根据群众要求办事,合作化虽说已有六七年,讲农民有合作化的积极性,实质上农民是留恋

单干的。单干，是农民根深蒂固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就改变过来。他们口头上说集体生产好，内心还是想单干。我们下去调查，要区别是真的群众意见，还是假的群众意见。上面领导同志就象中央主席、省委书记最好亲自下去摸清实际情况，不要光听汇报。因下面有的同志，往往是投领导之所好，看上级的眼色、意图行事，不讲真话说假话，有的好大喜功，为了显示自己的本领强，成绩大，就报喜不报忧。

孙振华：宣传包产到户优越，实际是宣传单干优越，假如说单干能恢复发展生产。那么我们旧中国的农民，为什么穷得要命呢？难道旧中国农民不是单干吗？究竟农民由穷变富的道路是什么呢？难道是恢复单干而不是走合作化的道路吗？

戴淑仁：我看土改后就不错。

张景良：土改后一小段时间，就是单干，如果不是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还会出现两极分化。如果我们还留恋土改后，不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吗？

戴淑仁：我们非得走那条路吗？

张景良：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农业合作化，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理之一，我们是干社会主义的，农村不走合作化道路，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呢？

戴淑仁：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应当走哪一条路，这一问题还没有解决，你说这一条道路好，人家说那一条道路